

社会转型期东西部农民分化 ——基于浙江和四川比较的视角

王亚明

【摘要】农民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关注的社会问题。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东西部代表的浙江和四川农民分化存在很大的差异，四川的非农化程度较低，收入和消费水平差距较大，这种差异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近几年来差距呈现出递减的趋势。无论是浙江还是四川的农民分化都具有过渡性，尽管浙江的农民分化程度相对较高，但是农民市民化程度滞后于城市化进程，而且难度越来越大。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无疑可以借鉴浙江的农民阶层分化经验教训，如市场化和非农化。为促进东西部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国家层面要完善区域合作和扶持机制。

【关键词】农民分化；西部大开发；共同富裕；浙江；四川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8273（2014）11-0024-0

农民分化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也是西部大开发中必须关注的社会问题。因为现代化意味着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就意味着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农民分化是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重要内容，在分化过程中产生了一些社会问题。在中国不同地区之间农民分化存在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表现。笔者主要分析四川和浙江农民分化程度差异的具体表现，探讨如何应对农民分化中出现的贫富差距和地区差距等社会问题，为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和农民分化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一、相关理论和分析框架

农民分化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和农民实现小康目标的直接动力，也是政府统筹城乡发展和实现社会和谐的首要问题之一。因此研究农民分化是转型的现实和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然选择，并一度成为政府和社会学界关注的焦点。但是探讨东西部农民分化差异的成果极少，以东西部农民分化差异为切入点，探讨农民分化无疑有助于为推进西部农村地区社会发展提供有价值的启示。

农民分化的相关理论主要包括社会转型、社会分化、社会流动、利益冲突、社会整合和邓小平“部分先富，共同富裕”思想等。社会分化是社会差别的历史动因，社会结构分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内容之一。社会分层研究所说的社会分化特指社会系统的结构中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社会地位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种不同社会地位的过程。^{[1] (p. 220)}社会学正是从社会分化的角度考察社会结构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有学者提出要依照农民实际从事的职业、使用生产资料的方式和对所使用生产资料的权利这样几个因素，对农村人口进行分层研究。^[2]有学者提出把社会资源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我们分层的指标体系实际上就是经济资源与社会权力的综合，而这种综合在农村社区最直接的体现就是个人生存权利与发展机会的受保障程度。”^[3]笔者主要采用职业分层的方法，并考虑收入和

* 本文系中国西部人才开发基金 会课题“转型期社会阶层结构变动中的利益调节机制研究 ——基于四川和浙江比较的视角” [201203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王亚明，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 级博士生，浙江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

消费分层。职业分化作为反映农民分化的指标具有简单明了的特点，但是职业具有单一的特点，也必然有区分的局限性。

农民分化差异的问题包括农民分化的具体差异，影响地区农民分化差异的因素，农村社会整合中的公共服务、社会制度和社会政策及社会组织发育，农民分化的趋势和对策等方面。浙江和四川分别是东部和西部农民分化的典型，笔者主要探讨浙江和四川两省农民分化的具体差异，主要是职业分化差异、收入分化差异和消费分化差异三个方面，一定程度上也涉及影响农民分化差异的因素等。

二、农民职业分化差异

职业分层是最重要的农民分层，职业是不同阶层的最大公约数，具体来说，农民分化为以下几个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乡镇企业职工，个体私营企业主，农村管理者阶层，农民工阶层，贫困农民阶层。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由于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浙江和四川两省农业劳动者阶层人口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浙江的农业劳动者总数相对较少，下降幅度大于四川的农业劳动者下降幅度，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与城乡劳动力比例相对较小。如表 1 所示，四川省第一产业就业人员从 1985 年的 2824.95 万人下降到 2012 年 1991.30 万人，人数减少 29.5%，占就业人口比例从 1985 年 75.5% 下降到 2012 年 41.5%。浙江省农业劳动者人数从 1985 年 1273.25 万人下降到 2012 年 517.03 万人，减少 59.4%，占就业人口比例 1985 年 54.9%，1999 年下降到了 41.0%，2008 年下降到 19.22%，2012 年达到 14.01%。2008 年浙江农业劳动者与全国水平相比低 20 个百分点，四川农业劳动者高出全国平均水平 7 个百分点。发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解决了土地粗放经营、弃耕抛荒等问题，能够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机械化水平。2002 年前后，伴随土地流转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浙江和四川的农业经营方式都发生一些变化，主要是规模经营成为一种新形式，农业效益和抗风险能力有较大提高。由于浙江农村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大量农户转向非农产业，这就使浙江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比全国的步伐快。^{[4] (p.77)} 比较而言，浙江农村土地流转时间和规模大大超前于四川。在城市化进程中，城郊农村土地被征用的力度越来越大，一些农业劳动者被迫离开他们赖以生计的土地，而成为非农人员或无业人员。据统计，在浙江，全省 1999—2001 年间共征地 89.48 万亩，失地农民 105.74 万人；其中 2001 年杭州、宁波、温州、台州等市的失地农民分别达到 11.38 万、6.18 万、9.42 万和 5.77 万人。不少农民也因此就地转变成了城市居民。^[5]

表 1 四川和浙江农业劳动者人数及占就业人口比例

	农业劳动者人数(单位：万人)			农业劳动者人数占就业人口比例（单位：%）		
	全国	四川	浙江	全国	四川	浙江
1985	31130	2824.95	1273.25	62.4	75.5	54.9
1989	33225	3086.83	1330.74	60.1	73.9	52.7
1997	34840	2872.4	1113.27	49.9	61.9	42.5
1998	35177	2824.4	1108.81	49.8	60.7	42.4
1999	35768	2747.08	1078.16	50.1	59	41
2006	31941	2306.9	717.81	42.6	48.9	22.63
2007	30731	2266.22	683.32	40.8	47.9	20.07
2008	29923	2186.18	670.16	39.6	46.1	19.22
2010	27931	2083.2	633.9	36.7	43.7	15.9
2011	26594	2043.36	529.99	34.8	42.7	14.43
2012	25773	1991.3	517.03	33.6	41.5	14.01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四川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联产经营承包责任制解放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国家和地方先后出台了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政策，农村非农产业就业人员迅

速增加，最初一般是在乡镇企业，其中的从业人员包括乡镇企业管理人员和工人。四川省非农产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业，这些产业吸纳了大量本地农民，1978 年四川乡镇企业从业人员 179 万人，到 1987 年，乡镇企业增至 169 万个，从业人员增至 631 万人，1990 年 705.74 万人。据统计，1990 年四川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占到农村劳动力总量的 14.4%，占农村剩余劳动力总量的 44.1%。^{[6] (p. 180)} 浙江经济从农村工业化起步，现代大工业基地已深入到浙江中西部的偏远山区。浙江省非农产业发展的代表是浙北的乡镇企业和浙东南以温州为代表的家庭企业。1995 年浙江非农产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比例为 45.4%，2008 年达到 71%，1995 年四川非农产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比例为 22.6%，2008 年为 44%。浙江农业剩余劳动力主要向工业领域转移，工业从业人员远大于四川，1999 年浙江工业从业人员是四川的 2.37 倍，2006 年上升到 2.71 倍。四川非农产业中建筑业从业人员远大于浙江，2008 年四川建筑业人数达到 382.66 万人，为浙江的 2.36 倍。2012 年浙江工业人数有较大增加，达到 959.93 万人，建筑业人数增加较少，为 177.54 万人。截至 2010 年四川工业从业人员人数和建筑业从业人数皆有较大增加，分别达到 377.17 万人和 430.52 万人。

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是改革以来新出现的社会群体，行业遍及三大产业内部各个行业，如农林、制造、金融、房产、教育卫生等。转型期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人数有两个发展高峰期，即 1993 年以后几年和 1998 年以后几年。由于现有统计一般只显示城镇个体私营企业数据，不显示农村个体和私营企业主人数，因此难以准确判断各个年份两省农村个体户和私营企业主人数，不过一些统计资料提供了零星的数据，让我们可以窥视两地农村个体私营企业的人数。1998 年乡镇企业改制和 2003 年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使许多浙江个体私营企业得到了较大发展。1998 年浙江农村个体户数为 117.35 万户，从业人员为 203.2 万人，遍及农业、工业、建筑业、运输业、服务业等行业，户数和人数大约为城镇的 3 倍左右，农村个体工业总产值是城镇个体工业产值的 6 倍以上，商业产值相当。^{[7] (p. 431)} 私营企业 10.02 万家（含城镇私营企业——笔者），从业人员 152.9 万人。^{[8] (p. 188)} 2003 年城乡个体户数 158.5 万户，从业人员 298.3 万人；城乡私营企业户数为 30.2 万家，从业人员为 484 万人。^{[9] (p. 496)} 四川省民营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但是由于起步晚，发展水平低，表现在私营工业比重较低，实力不强，企业规模小，不同行业发展程度差别很大，省内地区间发展极不均衡。1998 年，城镇私营企业及个体从业人员人数为 118.6 万人，不及浙江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人数。2005 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个数大体相当于浙江的 14%，私营企业主收入相当于浙江的 15%，工业利润相当于浙江的 11.34%，出口交货只相当于浙江的 2.09%，因此，四川的个体和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注册资金和营业收入等项指标均远低于浙江，2004 年，全国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在 9.72 亿以上的 500 户企业中四川只有 18 户，占 500 户企业收入总额的 2.72%；浙江有 183 户，主营收入占全国的 32.14%。^{[10] (p. 19)}

农村管理者阶层，主要指享受常年补贴的村委干部，即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主任、会计等村级组织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不脱产，本人身份是农民，家里承包有土地。撤社建乡后，村委会承担着一定的行政管理和政治职能，并被赋予征收提留代收统筹和对乡村公共财产占有处置及收益等多项重要的经济权力。1995 年，浙江的村委数量为 4.34 万个，随着乡镇数量的减少，村委数量呈现下降趋势，2003 年，村委数量为 3.8 万个，以每个村村委干部 10 人计算，相应村委干部数量大约从 1995 年的 43.4 万人下降到 2003 年的 38 万人。2012 年，村委数量下降到 2.88 万个，村委干部数量下降到大约 28.8 万人。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四川的村委也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村委的数量从 1993 年 5.5 万个下降到 2005 年的 5.12 万个，2008 年村委数量为 4.84 万个，相应村委干部也呈现递减的趋势，以每个村村委干部 10 人计算，大约从 1993 年的 55 万人下降到 2008 年的 48.4 万人。四川农民人口数量大于浙江农民人口数量，1998 年，四川每个村委管理的乡村人口大约 1200 多人，浙江每个村委管理的乡村人口为 800 多人，截至 2012 年，每村的人口都有所增加，浙江达到 1340 人。就村委干部成员来源来说，由于村民自治以及农村经济市场化进程，浙江农村经济能人积极参政，竞选村委干部，据粗略统计，在浙江全省 13.32 万名村委会成员中，先富群体约占 30%。其中义乌市共 2746 名村委成员中，先富群体当选比例高达 60%，而在村民委员会选举中，新当选的 421 名村委会主任中先富群体比例更高达 65%。此外，在永康、东阳、瑞安、乐清等地，先富群体当选村委会成员的比例也都在 60% 左右，比例之高，居全国前列。^[11]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流动的重要形态，农民工阶层是常年或大部分时间从事第二、三产业，但户籍在农村，有承包地，身份是农民的社会群体。农民工进城将有效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农民工进城有助于缩小城乡差别，并有望逐步从根本上解决长期以来城乡隔绝和对立的不公平和不公正的局面。^{[12] (p. 122)}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工人数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全

国农民工人数 2005 年为 1.2 亿，跨省流动就业的农民工约为 6000 万人。在跨省流动人口中，从四川流出的占 16.4%；从流入的地区看，流入广东的占 35.5%，流入浙江的占 8.7%。四川流动人口数量居全国第一位，浙江人口流入量居全国第二位。农民工以青壮年劳动力为主，男性居多，整体文化素质和技能偏低，就业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中西部地区为主要输出地，东部地区为主要输入地，半数农民工跨省流动。浙江省是东部省份，农村外出劳动力一般在本省流动就业。根据浙江省统计局 2006 年统计数据，浙江省农民工总数已达 1783 万，其中本省农民工约 1260 万，外省农民工约 523 万，农民工已经成为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13]据笔者调查，浙江农民工在家乡附近企业打工者较多，他们不愿远离家乡，一般早出晚归。此外，浙江农民兼业现象较普遍，很多农民在附近城区的企业兼职，不分年龄性别，即使有些兼职收入并不高。四川是西部省份，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较多，全省 2006 年向外输出劳动力达 1739.4 万人，这些人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是靠出体力换取收入，从业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季节性和风险性。^[14]在广东各地市的川籍民工有 520 余万人，四川 60% 的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在广东省。^[15]

三、农民收入分化差异

笔者所指收入分层是广义上的收入分层，是指按总收入分层，除了工资，还包括养老金、福利收入、投资利润、储蓄利息、租金等。

改革开放以来，两省农民人均收入都有明显增加，特别是 2005 年由于推行农业产业化、实施统筹城乡发展和新农村建设，农村收入增加较大。四川一些农村实行规模经营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也有较大提高。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居全国前列，四川农民收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在西部地区居前。如表 2 所示，四川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116.7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7001.43 元，年均增长率为 12.8%；浙江农民人均纯收入从 1978 年的 165 元增加到 2012 年的 14552 元，年均增长率为 14.1%。改革初期，浙江和四川两省农民收入差距不大，80 年代中期以后差距逐渐扩大，90 年代后差距扩大到 2 倍以上。1993 年，两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698.3 元和 1746 元，后者是前者的 2.5 倍，1997 年为 2.19 倍，2003 年后为 2.44 倍，差距经历回落后有所扩大。2008 年差距为 2.24 倍，2010 至 2012 年两省农民人均纯收入依次为 2.22 倍、2.13 倍和 2.07 倍，收入差距呈现递减的态势，收入差距下降表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理论的“累积性因果循环”，亦说明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农民收入的“涓滴效应”得到显现。

表 2 四川和浙江两省农民人均纯收入(单位:元)

年份	全国	浙江	四川
1978	133.6	165	116.7
1985	397.6	549	315.1
1988	544.9	902	455.4
1993	921.6	1746	698.3
1997	2090.1	3684	1680.7
1998	2160	3815	1789.2
2003	2622.2	5431	2229.9
2007	4140.4	8265	3546.7
2008	4760.6	9258	4121.2
2010	5919	11303	5086.89
2011	6977.29	13071	6128.55
2012	7916.58	14552	7001.43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四川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伴随着农民收入总体增长，农村收入分化明显。据国家统计局农调总队对全国 31 个省（区、市）的 6.8 万个农村住户的抽样调查，2004 年，农村贫困人口人均收入为 579 元，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 1/5。^{[16] (p. 328)}浙江农民不同群体的收入差距很大，四川也是如此，不过差距相对较小。按五等份分农村居民家庭每人全年总收入，2008 年浙江低 20%收入户为 5365 元，高 20%收入户为 25767 元，后者为前者的 4.8 倍；^{[17] (p. 189)}2008 年四川低收入户为 3753.45 元，高收入户为 10399.75 元，后者为前者的 2.77 倍。就是说四川农民内部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18] (p. 215)}

调查发现，浙江农民工在非国有企业就业一般享有社保，非浙江籍的外地农民工只有具有熟练技能并达到一定工作期限才能享有社保。由于工作不稳定等原因，很多四川农民工在流入地不能享有社保，如四川农村女性只有 40%与工作单位签定了劳动合同，办理医疗、工伤、养老、失业、生育保险的分别为 23.8%、19.1%、15.8%、8.1%和 6.7%。^{[19] (p. 332)}

四、农村消费分化差异

恩格尔系数是国际通行的衡量消费水平的指标，也是消费分层的划分依据。国际上根据恩格尔系数确定了一个划分贫富的标准。该标准是：30%以下为最富裕阶层，30%—40%为富裕阶层，40%—50%为小康阶层，50%—60%为勉强度日阶层，60%以上为绝对贫困阶层。2002 年，浙江省农村人均消费性支出 3693 元，其中食品支出 1508 元，恩格尔系数为 40.8%。2004 年，四川省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为 2010.88，其中食品支出 1118.34，恩格尔系数为 55.6%。如表 3 所示，1997 年浙江生活达到小康水平，2003 年进入富裕生活的行列，浙江农民进入小康水平比四川提前 10 年以上。2012 年，全国农民的恩格尔系数达到 39.3，进入富裕水平；同年四川恩格尔系数为 46.8，仍在奔向富裕的路上，而且有较大距离。

表 4 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生活消费支出比较(单位:元)

年份	全国	浙江	四川
1990	538.05	897.88	509.16
1995	1310.36	2378.38	1061.15
1999	1577.42	2806.62	1426.06
2001	1741.09	3497.17	1497.52
2002	1834.31	3692.69	1591.35
2005	2555.4	5215	2274.17
2008	3660.68	7072	3127.94
2009	3993.45	7375	4141.4
2010	4381.82	8390	3897.53
2011	5221.13	9644	4675.47
2012	5908.02	10208	5366.71

资料来源：根据历年《四川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收入的差距必然在消费方面反映出来。农村生活消费支出指农村常住家庭年内用于日常生活的全部开支，包括生活消费品开支和文化、生活服务费用开支两大部分。如表 4 所示，与全国一样，两省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不断增加，四川农民生活消费支出从 1995 年的 1061.15 增加到 2012 年的 5366.71 元，年均增长率为 10.0%，2008 年居全国中等偏下水平，在西部地区处于第一位；同期浙江的农民生活消费从 2378.38 元增加到 10208 元，年均增长率为 8.95%，2001 年以前不到全国水平的 2 倍，2001 年为 2.01 倍，2005 年为 2.04 倍，2012 年为 1.80 倍。1995 年，浙江农民消费支出是四川农民消费支出的 2.24 倍，这一比例持续到 2008 年后逐渐下降，2009 年为 1.78 倍，经历 2010 和 2011 年上升后，2012 年回落到 1.9 倍，2008 年以来消费差距呈现递减趋势。

在消费支出中，浙江农民增加幅度较大的是文教娱乐用品服务、交通和通讯，在以上两方面四川农民消费差距明显，1995

年以来浙江农民文教用品及服务支出超出四川 1 倍左右, 2005 年达到 3 倍, 2008 年为 4.23 倍, 2012 年为 2.67 倍, 差距大大缩小。1995 年, 交通与通信支出浙江为四川的 4 倍, 2005 年以后, 差距有所缩小, 但是保持在约为 3 倍左右。2012 年仍在 3 倍以上。2008 年底, 四川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也少于浙江农村家庭。

表 3 四川和浙江农民恩格尔系数比较 (单位: %)

	1994	1996	1997	1998	2004	2005	2006	2008	2011	2012
四川	62	64.2	62.4	60.5	55.6	54.7	50.7	52	46.2	46.8
浙江	47.6	50.4	48.5	47.1	39.5	38.6	37.2	38	37.6	37.7
全国	58.9	56.3	55.1	53.4	47.2	45.5	43.02	43.7	40.4	39.3

资料来源: 根据历年《四川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而成。

由于农村内部收入差异, 农村内部消费分层明显。2008 年, 按人均纯收入等级分组, 浙江低 20% 收入户全年总支出为 6376 元, 生活消费支出为 3603 元, 恩格尔系数为 45.8%, 处于小康水平, 高 20% 收入户全年总支出为 20369 元, 生活消费支出 12844 元, 恩格尔系数为 31%, 处于富裕生活水平。两者在住房、医疗保健、交通工具和娱乐等一些消费支出方面差别极大。^{[17] (p. 192)} 2008 年, 四川省按收入五等份农村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支出, 低收入户平均每人全年总支出为 3956 元, 生活消费支出为 2256 元, 高收入户全年总支出为 8136 元, 生活消费支出为 4801 元。^{[18] (p. 215)}

应当看到, 无论是浙江还是四川的农民分化都具有过渡性, 表现在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和阶层分化的不稳定性等方面。不完全性指职业分化的农民户籍仍在农村, 只能被称为半城市化而不是完全的市民化。尽管浙江的农民分化程度相对较高, 但是农民市民化程度滞后于城市化进程, 而且难度越来越大。并非所有农民愿意放弃自己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 特别是一些经济相对发达, 以农业为重要生活来源的农民。调查中发现许多已经职业非农化农民的逆城市化倾向, 即留恋农村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不愿意转为市民, 这种倾向一方面体现了亚当·斯密以来经济学家关于人类行为追求财富最大化的经济人假设; 另一方面, 不仅与城市化潮流相背离, 而且与国家推进转移人口市民化政策对立, 需要政策层面积极回应。四川的农民分化取决于农村工业化包括农村加工业的发展, 但是经验证明这不是唯一条件。由于地区经济社会的差异, 以四川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不可能完全照搬照抄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农民分化的经验, 但是无疑可以借鉴以浙江为代表的东部地区农民分化的经验, 如市场化和非农化等。同时要在推进城市化的同时也推进农民市民化, 通过土地流转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要加强对农民的权益保护, 避免东部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地方对农民的剥夺。由于四川等西部地区资源丰富, 现实途径之一是进一步提高新生代农民技能和文化素质, 同时要吸引外出农民工回乡兴办加工企业, 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益和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从国家层面上讲, 为促进东西部均衡发展和共同富裕, 要逐步完善区域合作和扶持机制。

参考文献:

- [1] 郑杭生. 社会学概论新修 (第 3 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 [2] 陆学艺. 重新认识农民问题——十年来中国农民的变化 [J]. 社会学研究, 1989, (6) .
- [3] 毛丹, 任强. 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中的几个问题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3, (3) .
- [4] 毛丹. 村庄大转型: 浙江乡村社会的发育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8.
- [5] 浙江省人民政府研究室课题组. 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市民化的调查与思考 [J]. 浙江社会科学, 2003, (4) .
- [6] 段志洪, 徐学初. 六十年四川农村经济结构之变迁 [M]. 成都: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2009.

-
- [7]浙江统计年鉴 1999[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1999.
- [8]浙江经济发展五十年[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0.
- [9]浙江统计年鉴 2004[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4.
- [10]辛文. 四川经济结构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M].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 [11]肖菁岳, 海智. 先富群体竞选村官调查报告, 浙江富人占 30%[N]. 都市快报, 2003-09-20.
- [12]胡鞍钢. 影响决策的国情报告[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2.
- [13]陈诗达, 张春玉. 浙江农民工问题调查报告[J]. 浙江经济, 2007, (11) .
- [14]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 四川: 提高农民素质是发展现代农业的迫切需要[HB/OL].
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dfxx/200703/t20070309_33186.html.
- [15]李雅琼. 六成四川民工打工首选广东[N]. 南方都市报, 2007-01-14.
- [16]汝信等. 2006 年: 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 [17]浙江统计年鉴 2009[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 [18]四川统计年鉴 2009[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09.
- [19]郭虹. 四川社会发展报告[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